



转折的一年

赫尔利使华与
美国对华政策

项立岭著

**CHINA
USA**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美关系史丛书·专著
重庆出版社

325437

中美关系史丛书·专著

转折的一年

——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主编

功正岭

重庆出版社

1988年·重庆

325437

责任编辑 张 凌

封面设计 李建国

技术设计 刘黎东

转折的一年——赫鲁晓夫与华政策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插页3 字数182千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80

ISBN 7-5366-0603-6/D·13

定价：2.40元



作 者 近 照

作者简介

项立岭，副教授，原籍浙江鄞县，
1934年11月9日生于上海。

195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在上海师院(现上海师大)历史系任教。1986年调深圳教育学院政史系任教。

自1958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70年代起着重研究中美关系史。曾先后发表文章近百篇，出版书10本，最近出版的书籍有《李烈均》、《抗日战争史话》等。现在是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SHAFR)会员，深圳教育学院政治历史系主任，香港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深圳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曾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但是，1944年秋以后，两国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曲折的时期。当时，在中国出现两个矛盾加剧的现象：一方面，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国共两党的矛盾加剧。在这两个矛盾加剧的情况下，罗斯福派赫尔利以特使身份来到中国。表面上，赫尔利来华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其实，赫尔利使华有更深的政治背景。

赫尔利使华的时间仅一年余，这一年多正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时期。

在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美国曾力促国民党部队抗日，力促国民党政权实行改革，同时希望同中国人民武装合作；但是，从1943年底到1944年，美国的这些政治、军事考虑已逐渐改变。

军事上，美国的“先欧后亚”方针改变为“欧亚并重”方针后，加强了太平洋战区的兵力，在跳岛作战中取得了进展。国民党1944年在日军进攻下的溃败，又使美军丢失了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美国政府从“空军为主”的观念出发，开始轻视中国战场。

政治上，美国一直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代表，战时和战后合作的对象。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维持中国就要维持蒋介石”。当国民党不抗日，把军队用于制造摩擦，而人民武装

却在积极抗日这一事实越来越明显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施加过一定的压力，并开始与解放区取得直接的联系。但是，在反法西斯胜利在望时，罗斯福把战后控制世界的政治考虑放在首位。他要依靠蒋介石政府作为美国的战后远东“稳定力量”。在几年的接触中，美国也明白，国民党政权已经丧失民心，极其虚弱。但是，这个政权又明白表示，在战后世界政治中要追随美国。因此，为了在战后控制远东，美国宁愿冒犯中国人民，而支持蒋介石。

在这样的背景下，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来到中国。他从白官得到的第一个训令是“增进蒋与史迪威将军间的关系，并使后者对其所辖的中国军队便于指挥”。这一使命与罗斯福的政治目标是不能相容的。因为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主要点，就在于要不要认真抗日，而罗斯福则已把这一军事上的考虑放在第二位了。所以，在矛盾不可调和时，美国政府必然迁就蒋介石。赫尔利没有“增进”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史迪威最后被召回了。

史迪威奉调回国后，赫尔利得到更明确的指示：“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根据这一指示，赫尔利着手“调解”国共双方的关系。在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那天，赫尔利飞往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后，签署了五点协议。但是，既然赫尔利的使命是“支持蒋介石”，他的目的就是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因此，回到重庆后，当蒋介石推翻五点协议，提出三点意见时，赫尔利立即转向支持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对赫尔利的调解是表示出诚意的。五点协议签署后，周恩来就和赫尔利一起飞往重庆，准备进行谈判。但是，蒋介石的建议和赫尔利的变卦，暴露出他们吞并人民武装的企图，所以，周恩来在指责赫尔利的叛卖行为，表示拒绝三点反建议后，返回延安。在以后的谈判中，美国感到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

计划一时行不通，对华政策举棋不定，罗斯福私下曾表示打算继续和中国的“两个政府合作”。美国政府也曾表示“中国最终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美国国务院和军队中一些有关人士还拟定了一些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的计划。对于这些表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但是，赫尔利、魏德迈根据白官原来的指令，坚持原来的立场，使一切和中国共产党接近的计划无法实现。

美国政府既然举棋不定，它的内部当然也会发生争论。1945年春赫尔利回国后，国务院有过一场辩论，赫尔利在辩论中是处于被指责的地位的。但是，他最终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将雅尔塔协议的意图告诉了赫尔利，并赞同他在中国的行动。接着，赫尔利在4月2日发表了“只支持蒋介石”的讲话。这个讲话，当然可以看作是反映了罗斯福的意图。这样，罗斯福在去世前，又把他一度动摇过的对华方针肯定了下来。

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了中国今后发展的正确方向。接着，中国共产党又明确要求美国“立即停止”“支持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专政，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做法。然而，中国共产党还是期待美国政府改变政策，表示只要美国改变这个政策，“我们并不反对到底”。

但是，杜鲁门政府继承了这种政策。在极端反共分子策划下美方制造的《美亚杂志》事件，公然破坏了中美两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结下的友谊。同时，美国在军事上和财政上加紧对蒋介石的片面支持，进一步增加蒋介石政权的实力，以便蒋在抗战胜利时控制全中国。

形势的发展，出乎美蒋的预料。日本投降时，处于抗日前线的人民解放军正在华东、华北向日军发动反攻，而蒋介石的军队

则远在西南，来不及赶去抢夺胜利果实。为此，美蒋一起采取了三项措施：命令解放军不准受降；命令日伪军抗拒解放军受降；美国从海空大规模运送蒋军到华东、华北。这一政策，是由美国陆军部、海军部、国务院联合决定，并经杜鲁门批准的。赫尔利和魏德迈则是执行者。杜鲁门政府还决定，继续将租借物资运送给蒋介石。

罗斯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失为一位伟大的人物，但是他在去世前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只支持正式承认的政府，虽然一般来说是对的，但当时中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政府——重庆政府和边区政府。在历史上，当中国出现两个政府时，如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清政府，美国至少在表面上还打着中立的旗号。这时，在中国存在两个政权，尤其是美国也承认重庆政府不抗日，不得民心，边区政府抗日并且得民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却连表面上的中立也放弃了。

这一政策是由罗斯福提出、杜鲁门继承的。决策者是美国总统，赫尔利作为驻华大使，是积极执行者。在先后两个决策者以及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对支持蒋介石这一总方针并没有分歧。但是在具体方法上是有分歧的。杜鲁门认为，中国内部问题的解决，应当先于中苏谈判；罗斯福和赫尔利则认为，只要苏联答应支持蒋介石政府，中国国内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赫尔利便认为可以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了。

中国共产党是明白赫尔利的意图的，并同美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亲赴重庆进行会谈。在会谈时，赫尔利鼓吹“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美军又在中国沿海登陆，帮助蒋介石政权抢占地盘。蒋介石政权在美国支持下，不断在各处发动军事进攻。然而，中国共产党既在谈判桌上表明了争取和平的诚意，又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坚持原则，同时在战场上击退蒋军的进犯。赫尔

利的打算完全落空了。

赫尔利的打算，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也引起美国持现实主义观点的人士的不满。美国人民、甚至部分政界人士纷纷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杜鲁门政府在碰了壁后，也不得不认为，支持蒋介石的步子走得太快、太远了。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首脑在1945年11月举行了三次会议，最后决定，要通过国共双方让步来解决中国问题。

赫尔利对自己执行的政策已遭到失败这一点，当然是清楚的。他不愿意当替罪羊，又不愿放弃原来的立场，因此突然宣布辞职了。赫尔利的辞职，表明了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的政策碰了壁。

赫尔利使华这一年余时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本书在论述这一段历史时，还希望通过事实表明如下几点看法：

1.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转变，是由罗斯福战后全球战略意图决定的。这一转变在赫尔利出使中国时已经决定，并非到赫尔利4月2日讲话时才决定。

2. 赫尔利来华的使命，不只是调解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而是有明确的“调解”国共关系的使命。这一使命是罗斯福直接授予的。

3. 赫尔利4月2日讲话并非他的个人行动，而是在罗斯福支持下发表的，赫尔利在华的行动，并非是有些美国学者认为的独立行动，而是在贯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4. 既然美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是从1944年开始的，而不是从1945年4月开始的，那末，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就不是对罗斯福政策的背离，而是对罗斯福政策的继续。

5. 杜鲁门是罗斯福政策的继承者，赫尔利是这一政策的执行

者，他们两人在根本方针上是没有矛盾的。导致赫尔利的最终辞职，只是为推卸责任的争吵。

中国共产党虽然明白美国政府的政策，但在1945年，中共在公开场合只是把批评集中在赫尔利身上。这是留有余地，还希望美国改变他的错误政策的表现。然而，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姿态，一直没有得到反应。11月美国三部首脑的决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马歇尔使华，杜鲁门12月声明，是美国在支蒋的路上走得太远后，收回半步的表现。这本是美国政府改变政策的一个机会。但是杜鲁门政府的根本政策仍没有改变，最后，终于导致了中国内战的爆发，中美关系从此走上了长期的曲折道路。

这一时期美国的有关外交文件已经公开发表，美国学者对这一题材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我国学者对此尚缺少系统的研究。在资料方面，虽然我国的有关档案尚未整理出来，然而大量已经公开的文件和当时报刊杂志的有关资料，是可供使用的。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较详细地分析研究中美双方的资料，写出这段历史来，这一任务当然是繁重和困难的。我愿以本书作为一个开场，以期引起我国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题材进行深入探讨。书中如有错误不当之处，望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项立岭

1985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赫尔利使华	(1)
第一节 矛盾的焦点	(1)
第二节 罗斯福的战略考虑	(7)
第三节 赫尔利出使	(15)
第四节 赫尔利在重庆的初步活动	(22)
第二章 赫尔利完成第一项使命	(33)
第一节 9月18日 电报事件	(33)
第二节 罗斯福的新方针	(41)
第三节 赫尔利促成召回史迪威	(47)
第三章 第一次调解活动	(58)
第一节 给赫尔利的第二次训令	(58)
第二节 五点方案达成	(67)
第三节 赫尔利背信食言	(75)
第四章 第二次调解活动	(87)
第一节 赫尔利阻止与中共联系	(87)
第二节 加强援蒋和清洗“中国通”	(95)
第三节 赫尔利的“得意之作”碰壁和二月报告	(103)
第五章 美国公开支持蒋介石	(113)
第一节 罗福斯拒绝“弹性政策”	(113)

第二节	美国驻华官员和中共努力越过赫尔利	(121)
第三节	赫尔利3月游说和4月讲话	(130)
第六章	赫尔利执行杜鲁门政府意图	(140)
第一节	游说伦敦和莫斯科	(140)
第二节	放手扶蒋反共	(148)
第三节	冷眼等待时机	(155)
第七章	赫尔利设想破灭	(164)
第一节	赫尔利和中苏条约	(164)
第二节	阻挠人民军队受降	(173)
第三节	和平攻势	(180)
第四节	重庆谈判与赫尔利的新策略	(188)
第八章	赫尔利辞职	(199)
第一节	美国政府感到形势“绝望”	(199)
第二节	三部协调委员会11月会议	(205)
第三节	晕头转向的11月27日	(214)
结束语		(228)
附录：中英译名对照表		(230)

第一章 赫尔利使华

第一节 矛盾的焦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它的军事战略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还是坚持这一方针，把主要兵力集中在大西洋方面，先集中力量打败法西斯德国，然后回过头来击败日本。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时，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对日本是进行牵制。

按照这一战略，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是处于守势的。中国战场则在对日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日本的大部分陆军都在中国战场，要牵制日本的陆军，当然主要依靠中国。

随着大西洋、非洲和欧洲战场上同盟国军队由劣势转为优势，到1943年夏，罗斯福的战略部署也逐渐变化了。在这年5月举行的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和三叉戟会议上，制定了“击败日本方案”。其中制定了美军在太平洋上进行跳岛作战向中国南部海岸逼进的方针。这年8月举行的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更正式确定了“欧亚并重”的方针。

1944年春夏之交，太平洋的战斗终于激烈起来。美军在跳岛作战中不断取得胜利。但是，由于日本陆军的抵抗，美军损失不

小。这一经验使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确信，通过跳岛作战去进攻日本本土是十分困难的，美军将要有惊人的牺牲。因此，他认为，继续使中国的军队发挥牵制和消耗日本陆军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一观点也得到英国的赞同。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曾在一项声明中表示：“为俄国和中国的人力提供必要的装备，以便使他们能作战，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政策”。^{〔1〕}罗斯福除了同意这一点外，还接受了驻中国的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的意见，要加强和利用在美国的空军基地。不论是利用中国的陆军和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都必须增强对中国的物资供应，必须反攻缅甸以打通滇缅公路。

美国的这些战略和方针，是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赞同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认为，中美两国的抗日斗争是相互支持的。“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的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2〕}对罗斯福的“先欧后亚”方针，中国共产党也认为是一项正确的方针。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在世界战局上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对德意须用主力，苏联已付其全力，英将辅之，而对日则有ABCD（指美英中荷）共同联合力量，美国且为其主。”^{〔3〕}在力量分配上，中国共产党后来也表示赞同美国先集中力量对付德国的部署。

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一致，打败侵略者。周恩来对此曾明确表示：

诚然，现在世界的战场虽有两个，但战争最后的归宿，却只有一个，不是反侵略国家的全部胜利，便是侵略者的凶焰烧遍世界。^{〔4〕}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愿意在苏美英等国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的时候，自己作出最大的牺牲，挑起在东方牵制日本法西斯的重任。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跳岛作战不断取得进展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则在中国大陆向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到处打击日军。如果没有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就能够抽调大批部队去对付美军的登陆部队，美军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战争中，美国曾以大量物资供应中国，然而，当时一切外援都是交付给国民党政府的。到1943年夏为止，国民党政府已从苏联得到3亿美元，从美国得到7.478亿美元，从英国得到1.185亿英镑。^{〔5〕}可是，国民党军队牵制日军的数量却不多。

在抗日初期，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作战是比较认真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国民党确定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后，就把军队集中到大西南，还用大量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限制人民武装的抗日活动。

尤其是到了1944年，在中国人民武装局部反攻不断取得成绩，美军跳岛作战不断进展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汤恩伯部队却在河南大溃败。这一溃败不仅影响了中国抗战的全局，而且对美国的军事计划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除了军事上溃败外，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也出现了危机。美国大使馆定期向美国政府所作的报告中，不断反映国民党政府“经济情况的日趋恶化与政府的行政机构的日趋瘫痪”。^{〔6〕}

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告诉美国，照此下去，罗斯福在中国的军事计划是难以实现的。美国大使馆在1944年整个夏天都在辩论如何能使国民党政府廉洁有效，如何实现中国的团结，如何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改革。驻中国战区的美军代表史迪威将军和美国大使高思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危机是重庆政府的

主义、行政和政策破产的结果，它不是仅仅由美国的援助所能解决的。为了抗日的目的，美国必需要求蒋介石政权实行激烈的改革，使蒋介石政权有最低限度的效率和廉洁。^{〔7〕}同时，为了改变大批国民党军队用于包围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史迪威坚决提出，要由他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以便把包围抗日根据地的军队用于抗日前线。他还主张充分向八路军提供物资，使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史迪威的主张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这一主张如能实现，即使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至少也会使中国局势有较大的改观。

在军事上，罗斯福希望中国战场起更大的作用，这和史迪威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赞同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主张。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改革，罗斯福在1944年6月派副总统华莱士出使中国。美国驻华机构为华莱士准备的材料特别强调，要向蒋介石提出国民党的军队解除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掉过头去对日本作战，同时也提到，要使蒋介石政府和苏联之间“增加了解”。^{〔8〕}这也就是华莱士使华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为此，华莱士和蒋介石连续会谈了三天。但是，蒋介石在会谈中坚持要阻挠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接触。最后，华莱士回避了与中共关系的问题，蒋介石则同意美派使团去延安。6月24日，华莱士离重庆去昆明。在去机场的途中，蒋介石又表示，在国共谈判中，愿意接受罗斯福的协助。但通过美国国务院与罗斯福联系，“道路太繁杂了”，希望罗斯福派一个私人代表到重庆来。^{〔9〕}

华莱士解决了派使团赴延安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国民党反共的问题，这一问题正是中国是否能有效地抗日的关键。驻中国的美国外交人员是比较了解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的。他们在华莱士离开后继续向美国政府提出看法和建议，要求美国政府运用自己的影响，迫使蒋介石停止反共活动。美国国务院则通过高思大使